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〇六期 ——  
(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209c)

---

【当事者说】“九一三”事件补白	符 浩
【史海钩沉】文革遗物里的春秋	姬 离
【文件汇编】毛泽东逝世有关文件	
【文献资料】1967年9月5日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的讲话	江 青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三)	周孜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当事者说】

### “九一三”事件补白

• 符 浩 •

近些年来，关于林彪叛逃的文章，在海内外报刊上多有登载，已使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昭之于世。每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不禁心潮起伏，我的思绪总是萦绕于15年前9月中旬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那十几个日日夜夜大概是我建国后我睡眠最少、工作最紧张的时刻。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后的情况可谓略知一二，谨记述如下，或可有助于补阙。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的工作，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13日零点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导，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13日上午，又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

14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是在党组书记、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有一种严峻感，而不像以往我们的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大家都很镇定，会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导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姬鹏飞同志。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应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韩念龙同志从姬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对蒙古的事务由他主管。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姬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住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情况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有：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当我站起来准备马上去落实总理的指示时，韩念龙同志又匆匆进来，我知道姬鹏飞同志约

他来是商量起草给我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约我驻蒙古使馆的指示于下午3时30分发出。

我把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局长张占武同志找来，和他商量后，指定了机要员小王专门译办来往电报，并要王立即搬到离我办公室较近的房间工作。

下午5时58分，我提前两分钟按指定人口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一眼就看见王良恩副主任站在偏东一边的走廊等候。我们来不及寒暄，他迎上来便说：“你来得很准时。”我回答说：“你好像已等了一会”他又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他特别提到董老，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回家吃过晚饭后，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同院乔冠华同志家里。他一看我就哈笑着：“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我也笑着问道：“今晚有什么好节目？”“当然有。”他略有些狡黠地眨了下眼，说道：“我前几天从箱子里翻出一幅章太炎书写的对联，刚刚挂上，特请你来一赏。”进了他的书房后，果然壁上新换了一幅对子，章太炎篆体书写的有碗口大小的字，盖出自太炎先生晚年之笔，神完气足，味道淳古隽永，在他的墨迹中应属上品。文曰：“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这是节录李白《夜泊黄山为殷十四吴会吟》一诗中的两句。乔冠华听到我连声赞叹，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其中的几个颇为古异于通常小篆的字说，这几个字选字得体，尤见太炎的功力。他告诉我说他特意请翟荫塘同志查出这几个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处。赏玩了一会儿，俩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地说道：“该言归正传了。”我们不由得放怀大笑起来。

我们都太兴奋了，这两天也都太紧张了，本应急欲畅谈一下。林彪叛逃事，那时还不能和家人、朋友谈，只能在“知情者”间谈。从何谈起呢？赏玩太炎这幅字。好像使我们都松弛了好多。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又抬头望着那幅对联，突然想起了另一位唐人的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听后，沉思了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

“月夜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警奇。

乔冠华刚把“改诗”用铅笔誊出，电话铃响了，是部值班室来的，又接到我驻蒙使馆报告了。我急忙告辞准备直接去办公室，临出门时，乔冠华说：“本应把半瓶茅台给你带去，不过你今晚就要酩酊大醉了。我这里有包速溶咖啡，给你带上，你会发现它的妙用。”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我国驻蒙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4人已于下午2时乘蒙方专机前往飞机坠毁现场视察。

9月16日晚11时30分，我批发了一份文件催问视察情况和现场停留一天的原因。

9月17日晚8时30分，我驻蒙使馆报告，大使等4人已于晚7时回到乌兰巴托，并简要报告了现场情况和延长时间的原因。

请示总理后，我用专线和许文益同志通了话，告其速派专人送回有关材料，并面报详细情况。

9月18日凌晨1时，接使馆报告，决定派孙一先二等秘书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部，并当面汇报。

9月19日晚，驻蒙使馆报告，孙一先于20日乘四次列车离乌兰巴托回国。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我和秘书王万慧同志早已到车站等候。孙一先和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同车到达，一下车我们就迎了上去。孙、贺两人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东张西望。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专程来接他们的。王万慧同志把孙一先同志拉到一旁，我低声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招待所。”随后又告诉贺喜同志，他可以独自回家，关于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之前要保密，不能外泄。

来到外交部招待所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孙一先同志便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交给我，我马上要王万慧同志先把这些东西带回部，把文件交给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同志妥为保管，胶卷交给正在待命的孙秀娟同志冲洗。然后，我对孙一先同志说：是周总理要我来车站接他的。并告诉他飞机坠毁，情况很复杂，要绝对保密。并向他交代了几条注意事项：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到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第四，随时准备汇报，并将一个电话号码和外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的名字写给他，如果有事可与他联系。

晚上，11时许，我和姬鹏飞、韩念龙等同志来到大会堂福建厅，总理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我们尽量在离他较近的沙发坐下，低声研究有关的问题。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同志被领了进来。周总理和他握手后，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还没等我讲完有关贺喜同志的情况，他一听贺已回家，便面色一沉，那双著名的浓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我的话：“你当过兵吗？”霎时间，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对外交部的许多干部的经历是十分了解的。他当然知道我曾在部队里工作过。记得我第一次单独见总理。是在1950年的7月，我被任命驻蒙古使馆临时代办，因为是新建馆，临行前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听完总理的指示起身告别时，总理半开玩笑地指着我说，“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时此刻，问我这个问题分明是批评我的警惕性跑到那里去了。他严肃地审视着我，好像真的等我回答是否当过兵。我立即回答：“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

约一个半小时后，服务员请我到隔壁房间接部值班室的电话，说已按我的交代把贺喜同志从酣睡中叫醒，并已送进招待所住下，待孙一先同志回去后向他转告注意事项。这时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每逢我回忆起敬爱的周总理，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回忆起他对我的工作中的教诲和批评时；这件事的印象总是那么深刻，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好像发生在昨天。说来奇怪，在我遇到困难，在感到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时，耳边常想起总理用十分严厉的语调问我：“你当过兵吗？”

孙一先汇报完情况，我看了眼手表，已是22日凌晨2时多。服务员送来了晚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唯独总理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按经验我知道会还要接着开下去。果然，先是李德生和邝任农同志到了，紧跟着是吴法宪。总理把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同志，并说，由你主持研究一下，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又对我说：“你也参加。”

杨德中同志和我来到东大厅，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仔细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我根据孙一先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作了必要的说明，大家就分析、讨论了起来。最后一致认为，李际泰同志的分析有道理。李的看法是：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机腹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与沙石冲磨，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从而导致全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来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唯一的处理办法，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原因，例如，机件失灵，或被地面炮火击伤而坠落，或击伤后被迫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杨德中同志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赞同这个办法。我又建议，最好把孙一先同志也带去。

早晨4点多，杨德中同志又去向总理汇报分析结果。我走出大会堂北门，天色微明，回头望去，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总理仍在工作。

9月24日上午，我驱车驶过天安门广场，看到成群的学生仍在庆祝“十一”排练队列，一切照旧。按照总理的指示，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当汽车从东单向北拐去时，我听到有广播车的声音，忙问司机同志：“在干什么？”，他好像明白我的心思，把车子靠在马路旁停下，并摇落车窗，声音十分清楚响亮：“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我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对他说：“我们走吧。”

9月26日晚，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在向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总理坐得很近，灯光下，我发现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瘦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我们告别总理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我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返回。

大厅里只有总理一人，他看我站在那里等他的指示，便摆手示意让我坐下，他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这时我猜想，莫非有了什么新的任务要我去做，可又不便主动提问。总理终于开口了：“你明天一早就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他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到：“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说，只告诉他一个人。

27日一早，在机场为代表团送行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告诉我，经请示总理同志，已允许在招待所住的那二位同志和家里取得联系。

9月29日，我们辗转抵达巴黎。当晚，我就前往我驻法大使官邸。与黄镇大使说笑一番后，我暗示他，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他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慢步，一边谈了起来。显然，他对我带来的信息，非常兴奋激动，我们情绪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他突然一拍我的肩膀，提高嗓子对我说：“走，老符，让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回到房间里，他打开了所有的灯，找出一瓶茅台，斟满两个精致的刻花高脚杯，他告诉我，这瓶酒他已珍藏多年，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整个屋子里扩散，我发现这酒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

这是我平生所喝过的最美的酒。

~~~~~  
【史海钩沉】

文革遗物里的春秋

• 姬 离 •

◇ 导言：从一张藏品说起

手头有一张“文革”时期的藏品，是军队系统的一个传达件，估计其时间是在1969年4月24日以后，或者说在1969年10月18日以后。这个传达件（八开对页）传达的是两个信息：一是（前页）“林付主席指示”（原文如此，非“副”字），讲纪律与自觉、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二是（后页）军委办公室通报北京整顿社会治安，问题多但讲得粗。传达件最后的标示“根据记录整理，供参考……”（原文如此）。

该传达件印刷较粗糙，印量似乎也不小。除了“林付主席”的“副”字用误了，文件里还丢字加补的现象；再就是版面有走墨的地方——可知是用打字蜡版油印的；由于印量大，有的地方有脱字即空白现象。

印量大与文后的标示“供参考”似有矛盾之处。据此分析此件虽是军内传达，但具有某种秘密性质。如军委办公室（后页）关于处理治安（含刑事）案件时，说“对犯罪分子，有计划地抓一批，判一批，杀一批，在犯罪地点处理，不贴布告（外国人多）。 ”

◇ 一、扑朔迷离的林彪讲话

该件上没时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是在林彪被中共“九大”确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之后，到那时“林副主席”这个称呼才真正叫响。（此话不确，如本期中江青1967年9月5日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的讲话中即称“林彪副主席”——编者注）1969年4月24日中共“九大”结束的晚上毛泽东与林彪出席一个文艺晚会，剧场内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微笑之际轻声地对林彪说：“下面该轮到你了。”果然，“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欢呼声涌浪而来（1）。

此时林彪还是较收敛的，虽然在为打倒政敌的“五一八讲话”（1966年5月18日，因其多涉政变方式与数量统计亦被称为“政变经”）时林曾杀气腾腾地说要对一些人“撤职”、“开除党籍”、“关入监狱”、“杀头”。真正一试锋芒的还是1969年10月18日的战略疏散命令即向全军发布的《林副主席一号令》（2）。

通观传达件的前页“林付主席指示”，口气比较平稳，其反映点有几处：一是讲“纪律靠自觉，也要组织保证”；二是讲“内部要团结，要顾全大局”；三是讲“党代会强调民主，过后集中，集中在中央，最后集中在主席那里。”

可能性有两点：1969年4月24日后，“一号令”前，林觉得还没有实际把握控制局面，说理性的东西多；“一号令”后，林自以为大权在握，对自己控制的体系讲话，无须以杀机相胁。

如果后者成立，那么林彪这个人在理论上还是有一套的。在谈国家强弱与纪律的关系时，林不仅引中国古代王朝宽容之政的好处，而且还把欧洲历史精炼成自己观点，林说：

国家强弱与纪律有很大关系，国家强盛的主要因素是集中统一。凡是破坏纪律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对外打敌人要统一，对内要团结。内部不团结闹矛盾，就要被敌人各个击破。不要老是上纲上得那么高，只要看方向一致，小问题不要斤斤计较。历来王朝都是如此，凡强的是集中统一，弱的不是集中统一，欧州（原文如此，应为“洲”字）强盛时期一些国家就这样。

引述这段话，无意为暴政化的“集中统一”辩护，仅是说，历史不是简单的“微言大义”或“笔则笔，削则削”的经典文本，在历史浮象的背后，还有许多因素要考证，哪怕我们建立是如经济学家般的“分析史”（如熊彼特）。试想一下，是不是林的讲话背后还有几条原因呢：一者，贺龙的夫人薛明反映林妻叶群在抗战时当过国民党某电台的播音员以及参加CC系外围组织的事（3），余波未平，林有意让部属不计较此（类）事。现在看来历史上所谓的“污点”，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那个极端的年代，谁又不力图说明自己“历史清白”呢？——现在想来，江青大可不必为演过蓝苹（并非“演过”，而是“曾名”——编注）去迫害那么多的知情者。可既然是历史，就有当时的局限。二者，林彪是个军事天才和谋略家，讲究达到目的手段，故不惜以共同奋斗的老将帅的前途与身家性命为代价（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另一种解释）。达到目的后，开始低调处理问题进而规划一个更明了目标。林指使陈伯达提“发展生产力”（4），可算是用心良苦了。三者，可能1970年修宪准备时，欲设国家主席的计划受挫，低调处理问题。

无论哪一种分析正确或接近事实，历史的证物也无言地告诉我们：看一个历史人物不要忘记其心理活动与人格的双重性，这样才避免陷入把历史当成教义的“悖论”。这不仅适合于已经定论的“反面人物”，也适合于“正面人物”，否则，历史将远离了真实。

## ◇ 二、可悲的“历史的寒号鸟方式”

中国人受微言大义与笔削史实的影响太深了，以致历史都是脸谱化的，要不为什么有谚曰：“富人的孩子多读书，穷人的孩子多看戏”呢？脸谱化的东西能提供一种简单的判断模式，从一般行为到意识形态，均适合。在现实中，人们常常把现实分成黑白对照，对现实的不满可以转化成对一个历史时期的追忆，并附上更多的个人臆断色彩。如果用“寒号鸟”的故事来比喻，这叫“历史的寒号鸟方式”。

想一想，无情的“三年自然灾害”，人为的因素造成了多大的损失？——饥荒的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并没有让政治浪漫主义回过头来反省。再想一想，“文化大革命”重复了中国历史上多么残酷的“昨天的故事”：一位普通女教师披头散发，颈项上挂着一只象征意义的破鞋，人格的虐杀，性变态的攻击；明代魏忠贤执政时期的“六君子”不是遍体鳞伤地裸跪于阶前吗？周围人都是无情的呵骂（5）。——礼仪之邦的教养哪里去了？更不用说“文革”时期国家主席的遭遇了。古代的大人物（左光斗等明代“六君子”），现代的小人物（有过“文革”经历的人都能目睹到的挨斗的女教师），都在人性最不受尊重、自由受到最残酷剥夺的漩涡中沉浮。

今不如昔，的确是一种“历史的寒号鸟方式”！它不仅把过去的一切随着臆想而美化，就象阿Q在土谷祠的梦那样自在，而且它还有更严重的反智倾向，拒绝着眼未来。在后一点上，甚至不如阿Q的土谷祠之梦。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普通的民众，毕竟他们接触到的历史真是有限的。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最使我自己感到震惊的是关于通货膨胀的典型解释：计划经济时代并不是不存在通货膨胀，而是它被人为地压抑了，那叫“压抑型通货膨胀。”（6）

如此一个简单的概念，支持了我十几年的经济学道路。我有幸从“历史的寒号鸟”思维怪圈中脱出，但我却无力去说服别人，。手头的藏品（传达件）给了我一个坚定的信心：那个时代

远不象具有“历史的寒号鸟方式”人们想像的那么太平。尽管今天的犯罪率远高于那个时代，而人们从没思考过被压抑了的东西。

### ◇ 三、无法纠正的惩罚过度

传达件的后页是军委办公室下达的指示，针对的情况是北京的社会治安：

打击犯罪分子是时候了，去年还不是时候，今年是时候了，要明确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时期的任务，北京偷东西、杀人、车辆×（原文脱印，空一字）有，流氓小偷很多。

客观地说，军委办下达的指示（或者记录者的记录）有点文理不通，标点符号的使用也不过关，但在传达件的背后，我们看到“文革”时期绝非“寒号鸟”所臆造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世界，也尽管这“太平”是数不清的人的身家性命换来的。只要再简单地照录一下，完全可以明了：

现在抓五种人，五类分子本人同控制的人、子女，百分之二十外流人员（包括汽车站、火车站），下乡知识青年逃回来的，社会青年，在校青年没人管，总的青年百分之八十。

活动采取成批的，计划的，家里有一个老太婆看家，大人去上班了，去一批人抢东西。把女同志的的确凉裤子逼着脱下来，有头头逼他去偷。

有幸的是，历史的陈迹总算没有完全在人们忘却痛苦的狂欢中化为缕烟纸灰（于是，我也深刻地理解到那些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思想家们的使命感），这么一小页油印的“文革”遗物（文物乎？）还记载着一个真实的“情况反映”，让后人知道那时的“太平”之代价。那些“犯罪分子”，有的被抓了，有的被判了，有的被杀了，但并没贴布告，原因是北京这个地方外国人多，要对国际社会封锁消息。且不说犯罪分子在刑事方面够得上相应的法律判决条款，在那个法制废弛殆尽的年代，谁又保证那不是一种“严打”呢？到今天，谁敢保证那些至今仍是“异端”的鬼魂们不是“惩罚过度”的牺牲品呢？假如一个年轻的孩子在父母（仍如前面那个女教师一样普通的人或许是某个级别的干部）受到冲击后，被迫走上街头发泄不满，抑或仅仅是为了把恐惧变成不理制嘶叫，他（她）不幸成为“犯罪分子”，谁来为年轻的孩子平反呢？

这是一笔无法算清的烂帐，也是没有结果的逻辑过程。就在这理不尽的俗世繁杂中，也许我们能窥到神圣的东西的并不全是美妙之处（就象所有美丽的女人都要排泄一样），何况这个“神圣”仅仅是对百姓们的一种并不一定恶意的迷惑（因为一旦我们将美丽的女人看在眼里，就会忘了她的乖张暴戾）。在那个传达件中，北京整治社会治安的措施包括建设兵团的收容作用，第4条说：“犯罪的抓了，送到建设兵团监督改造，高干子女也一样，父母要送子女归案。”，第6条则是“动员下乡青年回去”。

### ◇ 结束语：别再匍伏于“神性”之下

一张不大的纸片，好一段沉重的历史！有引人要进入专业史家领域的扑朔迷离，也有让人感到窒息的现实白描。

固然，我们要毫无曲护地批判“历史的寒号鸟方式”，在另一端我们也许该为伤痕文学以及今天以叙述事件真实为己任的“回顾政治学”（暂时这么定义，有待史实界定）打上一个句号。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史实，需要的是一种完整的分析史，从中找到该走的路。否则，一边是“历史的寒号鸟方式”，另一边又是喋喋不休的叙事。而这类叙事仍然没有



从“神性”的怪圈中走出来，更多的意愿还是忘记了真正的人性不应把自己的悟性完全托付给所谓的“神性”。

注释：

〔1〕见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P 233，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同〔1〕书，P 217—219。

〔3〕其实这是1943年的一个中共党内斗争的小事件。延安整风期间贺龙夫人薛明曾硬拉叶群去当时中组部长王鹤寿处说清问题。此时林去重庆参加谈判，贺亦没在延安，事后贺曾善意与林化解此事，林缄默无应，至1966年9月，贺处境被动，自认林为叶事报复。具体经过，详见〔1〕书P 222—223。

〔4〕这仍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事例：陈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稿时，拟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讨论此稿时，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的稿是“鼓吹唯生力论”；陈在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所拟“九大”政治报告稿提意见时，明显地反对康张姚的运动观，言曰：“还是应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有关记述可见叶永烈《陈伯达传》P 495—497，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5〕：《国榷》卷八十六记“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受迫害状，云：“比时垒垒跪于阶前，诃詈百出，裸体辱之，…创痛未复，不再宿，复加榜掠。后讯时皆不能跪起，苛桎梏平卧堂下，见者无不切齿流涕。”今人周怀宇主编《贪官传》有张健《贪婪残忍的明末阉党魏忠贤、崔呈秀》一节引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又叫“抑制性通货膨胀”（suppressed inflation），此术语见诸中国大陆典籍最早为刘鸿儒主编《经济大辞典·金融卷》P 31，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附件：

#### ◇ 《林付主席指示》

纪律靠自觉，也要有组织保证。思想差别是有的，现在有，将来有，中国有，外国有，一万年还会有。我们队伍里有年老的，有（此处为空掉一字）青的，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我们不能各搞各的，各行其事是不行的（“不行的”三字走墨不清）。要统一，就要有好的领（“的领”两字走墨不清）导，要出好主意，大家跟着干。

国家强弱与纪律有很大关系。国家强盛的主要因素是集中统一。凡是破坏纪律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对外打敌人要统一，对内要团结。内部不团结闹矛盾，就要被敌人各个击破。不要老是上纲上得那么高，只看方向一致，小问题不要斤斤计较。历不王朝都是如此。凡强的是集中统一，弱的不是集中统一，欧州（原文如此，实应为“洲”字）强盛时期一些国家就这样。

思想差别多得很，行动要统一，有些问题对不对，一时看不清，当时认为不对，过一个（“个”字漏掉，被打在该行“一”与“时”两字上）时期看看是对的。内部要团结，要顾全大局，对敌人行动要统一是一条，内部团结是一条。

部队纪律要搞个材料，报上要宣传，机关整党要学习。纪律本身有阶级性、自觉性、强迫性。人和动物区别之一，必须有纪律性、集体性，人是社会性的。无阶级社会，没有集体就不能战胜自然，有阶级社会没有集体，就不能战胜自然，也不能战胜敌人。要加强纪律性，创造毛主席提出的：“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

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一个时期强调民主，一个时期强调集中，整党阶段民主，过后集中，党代会强调民主，过后集中，集中在中央，最后集中在主席那里。不能七亿人都来开会。军队成为野马怎么行，这肯定不是无产阶级作风，是小资产阶级作风。要打败敌人，团结内部，两者缺一不可。有些问题可挂起来，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对敌。（原件八开对页纸到此处为前页）

◇ 北京整顿社会治安，军委办公室下达的指示：

打击犯罪分子是时候了，去年还不是时候，今年是时候了，要明确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时期的任务，北京偷东西、杀人、车辆（此处为空掉字，不知补上何字才通顺）有，流氓集团小偷很多，北京偷东西目标主要是（“是”字漏掉，被打在该行“要”与“外”两字上）外调人员，北京地方大，我这里偷，轰一下，就到那里去，北京是首都，抓到小偷又不是打讲政策。

现在抓的五种人，五类分子本人同控制的人、子女，百分之二十外流人员（汽车站、火车站）下乡知识青年回来的，社会青年，在校青年没人管。总的青年百分之八十。

活动采取成批的，计划的，家里有一个老太婆看家，大人去上班了；去一批人抢东西，把女同志的的确凉的裤子逼着脱下，有头头逼他去偷。

北京大院多，打群架。

八条措施：

- 1、组织五人组织，对犯罪分子，有计划地抓一批，判一批，杀一批，在犯罪地点处理，不贴布告（外面人多）。
- 2、迁返原地。
- 3、对外来的人，加强清整工作。
- 4、犯罪的抓到了，送到建设兵团监督改造，高干子女也一样，父母要送子女去归案。
- 5、一般犯罪分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进行教育。
- 6、动员下乡青年回去。
- 7、加强对在校学生教育，假期要加强教育。
- 8、加强交通秩序，不要开快车。

……根据记录整理，供参考……（原件到此为后页页，全文至此完）

~~~~~

## 【文件汇编】

### 毛泽东逝世有关文件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公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他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用人民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乘胜前进，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他以无产阶级革命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崇敬。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逝世，定将在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悲痛。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要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坚决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我党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地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附：

为了表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现决定：

（一）九月十一日到九月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共中央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的人员，可在本单位举行吊唁。

（二）九月十八日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

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三）从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致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四）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的以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致哀三分钟。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三分钟致哀。

（五）对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来华吊唁，我驻外使领馆应表示深切感谢，并转达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关于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的决定。

特此公告。

◇ 华国锋在九月十八日追悼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三千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养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五十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建国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地反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

我国的武装挑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了“三支两军”，为人民立了新功。我军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强大武装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最根本的，就是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任何敢于入侵之敌，都必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大海之中。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提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战胜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现在，毛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

## 【文献资料】

1967年9月5日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的讲话

• 江 青 •

1967年9月5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江青就“5。16”组织、揪军内一小撮、革委会等问题做了讲话。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全国认真学习江青的这一讲话。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好！

我来得很仓促，康老把我拉来了，要我讲几句话。事先没有准备，讲对了的，供同志们参

考，讲错了的，同志们批评我，炮轰我，火烧我，都可以。

我想讲一讲形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对形势，如果孤立起来看，当然在某些地方，个别的地方，存在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但是，形势总应该全面地来看，历史地来看。如果全面地历史地来看。今年和去年这个时候比较，是不是大不相同呀？去年这个时候，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地方上的爪牙，还是相当有点活动能力的。而现在呢，他们瘫痪了，有的被革命小将打倒了。瘫痪本身不是坏事，因为“走资派”不能够让他再动，对吗？不少地方在“走资派”打倒以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余的地方，中央也正在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大城市一个大城市地来解决。有的已经达成协议，问题基本解决了。有的正在解决。像你们安徽省吧，就请了同志们到北京来开会，解决问题。你们安徽省的形势与过去也不同了嘛。以李葆华为首的这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来了，甚至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还有程明远那个叛徒都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同志们，刘秀山这个坏人，我是很早就知道了，只是没有戳穿。我有材料，他是个坏人。刘秀山害怕群众揪他，逃到北京，躲了很久，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他在背后操纵，可能有些好人上了他的当。要注意，不能够把好人和坏人搞在一块。当然，上了当的人，受蒙蔽的人，要觉悟过来。

从去年到今年，你们看有多么大的变化！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那样，中国就可以不变颜色了。他执政了很长时间，搞反革命两面派，有一整套的干部路线来保证他的错误的政治路线，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将们立即上阵，一下子就把这些家伙统统揪出来了。

当然，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你讲的倒容易，我们在那里斗的可厉害啦。同志们！我们也斗的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情况。现在不需要那样的武斗，武斗总是要伤害人的嘛，总是要破坏国家财产的嘛。为什么要做败家子呢？在这里我要说明，“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你们双方不要回去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那就不好了。（康生插话：现在不单是这样子；还动了机关枪啊！）那更不好。

总的说，我觉得形势是大好的，锻炼了青年一代，锻炼了小将们，锻炼了革命干部，也锻炼了老年一代，象康老。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安徽问题复杂，不见得。安徽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大好，现在的情况比早一个时候更好。过去你们互相之间吵得很厉害，还动过武，现在能够坐下来一起谈了，不是那么气的动武啦，这就了不起，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个别地方还有反复，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各地也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的现象。总的趋势是往好的方面发展。但这要有以下几个好的条件：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领导，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够保证全国范围的革命的大批判运动。

阶级敌人是不甘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有美国特务、苏修



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等等，这么多的黑手藏在背后，你们不容易识破，他们以极“左”的面貌或者以右的面貌出现，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他们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月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是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的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很坏的人。你们安徽也有人反对中央嘛，中央的“九条”、“五条”都反对，拒不执行嘛。如果按“九条”好好地办下来，就不致于现在又反复了。但反复也好，你们多来一次也可以，欢迎。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你们切不可上当，你们现在都在北京，难免有人向你们进行活动。收集我们的材料，我们也不怕，因为心里没有鬼，怕什么呢！你们去收集吧，你们吃饱了饭没事干，想干这个，不干革命。那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是不怕的。

他们过去就整过我的黑材料，这一次才发现。有一个专案组在上海，去拿材料的时候，说其中有一箱材料是我的，他们没办法，我说拿来嘛，拿来以后我也没有过问。你们看，一大箱黑材料，谁晓得是些什么东西。我们最近发现有的地方成立所谓“特档”（特别档案），专门用来对付我们。所有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小丑所搞的小手法。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还有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的，总是千方百计地作垂死挣扎，我们要提高警惕，识别他们，并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觉悟起来，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一小撮孤立起来。既要反对从右的方面又要反对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这个问题值得同志们充份注意。

第二个问题就是军队。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尽管我们军队有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不允许这样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请问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好的军队？你们抢他们的枪，打、骂都不还手，不还口，世界上有没有？所以现在不能上敌人的当，到处乱揪“军内一小撮”。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就有错误。他们跑到外头去大串连，去年是点革命的火，现在又出去，那就是帮倒忙了。说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有个别的地方就是这样。这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当了。因为青年人喜欢动，而斗、批、改非要坐下来看文件、看材料，然后非动脑筋不可，这个比较艰苦。跑跑颠颠，这是青年人的特性。听说武汉造反派“钢二司”，刚刚翻了身，他自己那个地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往全国跑起来了。这个要注意，你们跑到那里去，不了解当地情况，一头栽进去，就犯错误了。还是要相信本地区的革命群众，不能去包办代替。正像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你们的革命一样，我们只能跟你们商量，支持和协助你们。

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现在这股风已开始刹住了。那么，同志们会问，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队的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对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应该给他们以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你不要光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

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安徽的情况，我一向都没有怎么摸，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有个军去了以后你们不欢迎呀？（康生：在合肥、淮南有人开始反对十二军，九月二日淮南“好派”还冲了三十四师师部的大楼。）把野战军冲乱可是不好啊。不能开这个头。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你们想想，广大指战员的出身都是贫了中农、工人。他们是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以前是不介入嘛！后来介入了，他们不摸底。有些事办得不对，有些话说错了，这是难免的。你们试试看，换一个位置试试看，犯不犯错误？我所说的是容易犯一般说错话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这是原则问题。所以对军队不能那样乱冲，不能去夺他们的枪。有的战士的枪被夺的时候急得哭了，因为他不能开枪。有些战士搞不清楚，以为来抢枪的都是革命群众，因此就叫人家给抢走了。在国防前线，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严禁夺枪，如果有人硬要夺，解放军战士有权自卫还击。中央已经通过了命令。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夺我的枪，我一定还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随便开枪是不对的。现在很多地方大部份枪是保守派抢的。有的地方不是夺，而是把枪交给保守派。只有少部份左派有枪。

第三个问题，要逐步地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这股子歪风除了针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着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以外，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更难免混进一点坏人，但它毕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这么一股风，又要把中央已经批准的革命委员会全部弄掉，这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那里挑唆吗？同志们，你们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事也要警惕。当然，有点反复我们也不怕。

总之，现在形势大好。但在大好的形势底下，要警惕三件事，就是从极“左”和从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搞这些破坏活动的背后不仅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有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苏修、日本等等特务。我们有材料，这次搞出了一大批，这是小将们的功勋呵！叛徒集团你们知道不知道？很大的特务案子，都搞出来了。有的潜伏了几十年，过去不知道的，这次都搞出来了。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功劳真是大！

再说一下，同志们要很好地警惕这三件事：有人要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我只想提醒同志们，我的意见要是不妥当，请同志们批评。

同志们，我们要创造良好条件，我们要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派，不要成为张家派、李家派。派性，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无政府主义，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我建议你们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好。双方都作自我批评，不是就不吵架了吗！比如你反对我，我就到你那里去作自我批评，然后你当然觉得惭愧，也找找自己的毛病，也作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冷静下来，互相谈谈，互相交换意见。求大同，存小异嘛！大“同”是什么呢？“同”，就是共同性，就是一起闹革命，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你们都是要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大原则底下，有什么理由不联合起来，有什么理由不团结起来，而闹你们的派性呢？闹派性，我看是不革命，是为自己不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就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要求自己，要求自己那个团体，而不是光严格地去要求别人，然后吵架、打架、武斗、抢武器，这样搞就不冷静了，也说不清是非了。是非总是应该搞清楚的，也容易搞清楚的嘛！在你们安徽，现在主要的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斗争以李葆华为首的“走资派”，斗不斗争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我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这个大前提是一致的，就是“同”

了嘛！“异”，就是不太一样的做法或者看法，那可以保留。我们小组也经常有不同的意见，并不是没有什么争论，但是我们能够在一致的大前提底下把“异”存起来。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可难呀。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阴暗面，有一个光明面，阴暗的一面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如果不革掉，总有一天会掉队的，总有一天会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的。头脑里的“私”字，个人主义啦，再大一点小团体主义啦、本位主义啦，一直闹到严重的无政府主义，谁的话也不听。这些人想把我们有良好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工作、良好的装备的野战军都要打乱。当然，这不是你们的本意，有坏人，他想达到他的目的，去挑唆你们，切勿上当。要心明眼亮，要冷静，要善于识别敌、友、我。你们现在有的时候连朋友也吵起来了，自己阵营里也吵得一塌糊涂，甚至打起来。你们想想，是分裂好呢，还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好？要搞革命的大联合，然后搞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够有领导，没有领导，革命不好进行呀。

同志们：你们想一想，冲击和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把作战系统打乱了，一旦有情况怎么办呢？现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怕我们，特别是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狗急是要跳墙的，我们不能不防万一。

不要在我们军队的脸上抹黑呀！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能在他们的脸上抹黑，要爱护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荣誉。

同志们，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被抢了。是炮弹呀，打美帝国主义的。后来，我们下了个死命令，管你什么派，立即交出，不交出就缴械。这样一来，他们吓坏了，才送回去了。

真生气呀。有人还抢了外国的船。北京还出现这样的怪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们知道这事吧？这样的怪事，如果是好人干的那是幼稚，如果是坏人干的，那就是故意破坏国家的荣誉。同志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那是肯定的。如果是在使馆外头，而不是在他的使馆内部，他作了任何违犯我们国家法律的非法活动，你们都可以有权斗他，把他扭送到公安部门去。但是，你们不能闯到使馆去，不能跑到外国轮船上去。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三）

• 周孜仁 •

（续上期）

20，七月山城，血火初起的日子

回重庆，八一五和反到底双方已经开打。砸派已经不叫砸派了，刚刚走马上任的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亲自给起名为“反到底”。刘副组长大约觉得砸派这个名字不雅，容易被对立派按谐音演绎为“杂种”“杂酱”之类意含讥讽的贬义词。事实上，八一五确实是这样干的，即便对立派已经被正式命名为“反到底”，他们永远把对方蔑称为“杂”系列。其实，1967年的七月，名称怎么叫已经不重要，问题是，以65事件为发端的武器的大批判，已经远比口头的批判更有说服力。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两江并流处，群山环峙，气候奇坏，交通发达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孕生了重庆人鲜明、火爆的群体个性，催成了许多耿介豪侠敢作敢为的血性汉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朋友、云南儿童作家张焰铎，第一次出差重庆，从小感受云南人的温婉内向，重庆人性格的火爆激烈曾让他大感惊诧。回昆明到我家谈说见闻，进门第一句话就是重重的惊叹号：重庆民族！重庆民族！他认为重庆人作为特殊的社会群落，其鲜明个性完全足以构成一个独特民族的文化特征。这种环境孕生的性格特质足够滋养邹容、江竹筠、成然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而它一旦被导向了邪恶，必如急流狂泻，演绎出破坏一切、毁灭一切的社会悲剧。另外，重庆军工厂极多，除了飞机，几乎所有常规武器都可以在此配套。据可以相信的资料记录，1967年7月，反到底派一次就从兵工厂把“一万二、三千条新式武器发出来扩散到外面”，所谓“反到底舰队”，三只船上均装备了大炮，“大的一只船装了十门之多”。而八一五派，也一次从国防厂“抢出一百二十万发子弹”。两个原因汇而合一，重庆成为中国文革武斗最惨烈的地狱渊薮，便很自然了。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文革前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教育，已把许多人起码的良知泯灭殆尽，而将仇恨膨胀到了临界点。如连接炸药桶的长长导火索，经过十多年的燃烧，到文化革命，算是燃到尽头了。人们对于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都毫不足惜。可以轻薄，可以践踏，可以蹂躏，可以屠杀。性格火爆而又掌握了杀人武器的重庆人，把人性的丑恶，残忍，演绎得淋漓尽致。

六月下旬，我还在成都、天真得一塌糊涂的“红成”娃娃们正壮怀激烈徒步北上时，重庆已经热热闹闹打起来了。据现在能够找到的资料，1967年6月23日，便有了双方由上百人参加的重医附小武斗事件。此役死四人，伤百余人。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再次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弹，死二人，伤数十人，附属一院门诊部被迫全天停诊。这次武斗中，重庆医学院66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反到底派在市中心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回肠荡气。“烈士”亲属作控诉发言，表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继续革命到底。

我至今清楚记得回重庆后一次经历：黄昏，不知为什么事情，我跟学校的卡车到了位于石油路的五一技校，那儿已成双方武力拉锯的前线。八一五派大坪地区武斗指挥部就设在那儿。暮色如晦，不大的校园里，技校的少男少女们全在备战。正是花季。他们应该穿着宽松的T恤和漂亮的连衣裙去黄昏的花园小道谈说自己的梦想和温情。但是，这时的他们却全都穿着肮脏的衣服在抬石头，将石头堆码在楼前构筑工事。还有的把石块砸碎，再用筐子挑进大楼作武器，更多的女生则用作业纸一包一包地分包石灰，也是做武器用的。所有窗户都已砸光，挂上草蓆做为掩护。这景象和革命电影《地道战》上老百姓对付“鬼子”进村时的繁忙毫无二致。我在兵慌马乱的校园里胡乱溜一圈，接着就看见有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把几个俘虏押上车来，眼蒙着。脊背被打得鲜血淋漓，长长的伤痕一道挨一道，像是用刀背砍出来的，十分可怕。第一次对一位受虐者做如此近距离观察，我心中不觉微微震颤。不是电影镜头的渲染，不是教科书的说教，不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中的模型，而是真实的、皮开肉绽一个活人！我不敢直面它。我只能竭力鼓动自己去回想一月前在风雨球场展示过的我的同学被打得同样血肉模糊的背，好让我迅速催生报复的快感，保持心理的平衡。

车开了，站旁边的人告诉我，说那是“红大刀”成员，“红大刀”是建设厂有名的武斗之花。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乘夜来此，是要将这几个俘虏运回重大。大坪地处两派热区，不安全，而地处沙区的重大，作为八一五的大本营，显然非常可靠了。几经折腾，车回重大，径直开到了六教学大楼。六教学楼虽然是我们电机系的教学大楼，我们上课做实验总在那儿进进出出，可除了知道这幢六层的黄色大楼是沙坪坝最高的建筑物，除了在月色清明的夜晚，从长满青苔的

石阶向晚自习的教室走去，心里会充溢着青春的情绪，我根本不知道下面有一条很可怕的暗无天日的地下通道。通道很长，中间还隔着几道铁门，扭动铁门把手，会发出地狱般的匝匝声。完全可以想像，将人关进去根本是无法逃跑的。那天的经历，使我第一次亲身感触，我们和对立派的仇恨已经完全白热而赤裸了，无法逃避也无法调和。不是我们把他们消灭掉，把他们像今天这些俘虏一样关进地狱，我们（包括我），就同样会被他们关进地狱，消灭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的教导已不再是“语录本”上的教条，它已经变成了1967年的中国人类群体每一成员必须遵循的生存原则和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是的，可怕的事情每日每时都在发生，都在不可动摇地刺激我们的神经中枢。我知道我已经被栓在奔向死亡的战车上。我别无选择。我只能从我的视角将他们一件件记下来，记录在我编辑的报纸上，如同无法逃遁的囚徒在墙壁上刻画记号，作为时间流逝的见证。在我重新接手编辑的第一份《815战报》（第三十一期）上，所有的版面都充斥着血腥和仇恨：

二版、四版：悲歌震华莹，碧血涌大江——望江机器厂反革命暴乱纪实

二版：七七枪声：六中小将惨遭枪杀 / 二七战士英勇献身；匪徒血洗歇马场 / 英雄头断红岩厂；

三版：死难烈士万岁。刊登了近日武斗死者生平事迹。死者计有：余成英。建设厂工人。六月二十三日，航峰、军工井冈山九一纵队“血洗”石油校时被长矛刺伤，抢救无效死亡，时年37岁；杨胜金，红卫纺织厂消防队员，六月二十四日上午被对立派毒打致死，死后被剜眼、割去耳朵和生殖器，用镪水腐蚀后沉江未遂。时年35岁；冯仲荣，望江厂工人。六月二十三日，在望江厂“反革命暴乱”中被井冈山派用三棱刀刺为重伤后死亡，时年四十三岁；余开泉，望江厂供销科长，在该厂“反革命暴乱”中被井冈山派惨杀，年龄不详；张朝喜，林校学生，六月二十八日被红阳中学对立派追打，落入水池。死后发现左耳被割，头顶钉进二寸圆钉一颗，左肋骨被打断一根，左胸被刺进一刀，喉管塞满盗草。时年十七岁；王吉强，供销社职工，六月二十四日凌晨被砸派用弹弓石头击中头部，跌下大楼，触断电线而亡，时年24岁；苏毅，六中学生，死时20岁；丁正贵，建设厂工人。七月一日被航峰武都队员连刺九刀而亡，时年31岁；邓树荣，重纺五厂老工人，据称，七月一日，为制止砸派暴徒破坏该厂锅炉，被进攻方用长矛刺中胸部、腹部和大腿，流血如注而亡；周芳英，重纺五厂老工人，和邓树荣死于同一事件，同一时间，被刺穿腹部，腹中，已满四个月的婴儿尚在。死者年龄不详。王崇杰，四川外语学院学生。七月三日，北碚八一五派抗议重纺五厂71血案，抬尸游行，砸派对游行队伍实施冲击，王腹部被长矛刺穿，肠子外流，血涌如注而亡；包自成，兵工厂（八一兵团20团，不知为何厂——笔者）工人，七月五日被“偷袭”的对立派用钢千刺穿左胸死亡，时年二十八岁。

其他的死者就是“七七枪声”一文中，被小口径步枪击毙的六中学生陈乐州、八一兵团65团的李叶明，七月八日，“反到底”武斗队伍“猛虎团”等的发动突然袭击中，红岩机器厂的死者，计有：黄习琨、吴华明、徐秋林、余春保。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815战报》的。如果说一个月前办《横眉》，我还表现了些许绅士风度，那么现在没有了。如果说过去，我做事情总会因种种原因而忧心忡忡，那么现在不了。我需要为自己的继续存在寻找一个理由、一个支点、一种方式。比如，我对自己说：八一五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作事要善始善终。比如，我对自己说，其他哥们都在舍生忘死，自己怎么能当软蛋？甚至对于自己的生命，也感觉不再重要。有一段时间，嘉陵江的对面，对立派炮弹夜夜都会在报社头顶呼啸，在黑暗的天空划出一道又一道红通通的弧线，我们不得不深

垂窗帷，施行灯火管制。在挥汗如雨的斗室，我记得我给一位深爱的女友写过一封信。她是我的同学，那时，她已逃回远离重庆的老家。我在信中对她说，我随时都准备死去。这封信可能就是我们的永诀。

于是，我接了战报这个招。现在，除了编辑霍晓琳（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和管发行的布依族同学韦亮清，《8 1 5 战报》的人员已经差不多都离开了。我必须迅速重招人马。

第一个是张国梁。霍晓琳推荐的。张是霍的同年级同学。我原来曾读过他的文章，犀利而机智，颇有鲁迅笔风。我和他到沿江马路谈心。我问他：“你喜欢写什么样的文章呢？”他的回答非常侃切：“骂砸派！”他说，“我就喜欢写骂砸派的文章！”

除了张国梁，还有一个张姓同学，叫张忠云，电机系四年级学生。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非常帅，其次，他不仅有工科学生慎密的逻辑思维，而且有极其灵活的政治头脑，这样，全国和四川、重庆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零乱事件，很容易就被他串在一起，然后抽象出一个高屋建瓴甚至耸人听闻的理论或者观点。他考进工科学学校完全是一种错误。他应该去当政客。他从政一定会大有建树。

另外还招了两个同学：采矿系的郭德福、冶金系的吴克。而挑大梁的，是两个张、我和霍晓琳。补充一点，名字极似女性的霍晓琳是个男生。好读书，工作勤勤恳恳，富于激情。我以为，我们四人，成了整个战报的黄金搭档，因此也就有了后来闯下大祸的《大局已定，8 1 5 必胜》及后来评论四川时局的一系列所谓“毒草”文章。

编辑部重新搭建起来了，但战事日紧，印刷器材供应、制版、发行等都很困难，无法保证按时出刊。比如第3 1期。7月20日出版。周期不准。很困难了。后来交通完全堵断，发行渠道完全已经不行。从3 4期开始，只能象征性地印一两千份，由编辑自己拿到街上去叫卖。原来报纸都是送到城里的印制一厂排版印刷的。七月下旬开始，就留在学校印刷厂自己印了。从3 4期可以看得出来，字体单调，印刷质量也明显差得多。

其实，在当时，报纸出多少份？甚至出不出，都并不重要了。在血火烽起的山城，舆论本身已经显得非常苍白无力。武器的批判已经整个儿代替了批判的武器。8 1 5战报继续出版，唯一的作用仅仅是为了表示了自己的存在。正如，当时有几人对抗文革还怀有当初的神圣之感呢？可大家还要在枪林弹雨中高呼着“为毛主席而战”而奔走呼号，为什么？他们已别无选择。不用武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就会被对方消灭掉。如此而已。

有一天，我和张宗云到沙坪坝卖报，一个女孩笑嘻嘻走来，我们以为她要买报，正要抽报纸给她，对方却急忙摆手。她把拳头纂着，举在胸前，要张把手伸开。张把手张开了，于是她也把她的小拳头伸过来，打开：一块金属落在张握满硬币的手上：一声清脆的叮当响。我们看清了，是一枚半自动步枪子弹。

女孩快活地笑起来，说：“拿去打砸派！”  
然后又是一阵胜利的大笑，她飘然而去。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熊波（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 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